

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

—美國大使館避難13個月



右圖為方勵之1989年在北大草地沙龍演講。

左圖為1989年6月11日，中國官方在電視發布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本報檔案照)



兩個人 卡住兩個大國

●(續昨)11月美國作出反應。那個月，將有兩位重要的「具有非正式身分」的人會見鄧小平，一是尼克森，一是季辛吉。前者答應幫助美國政府作這件正式的事，後者拒絕，不願意介入方勵之的問題。

11月2日和14日，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的「老朋友」尼克森和季辛吉。兩次都談到方勵之的問題。儘管季辛吉不願意介入這個問題，鄧小平卻還是向季辛吉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在鄧先生的促使下，季先生還是不得不介入了這個問題。

鄧小平：方勵之必須認罪

鄧小平兩次談話內容大同小異，要點有二：一、准予方勵之離開中國。二、「方勵之必須認罪」，並保證今後不再反對政府。他的目的很顯然，既想恢復中美政府之間的「老朋友」關係，又想消滅他的一個「老眼中釘」。他的策略也很顯然，把「包袱」再推給美國，要大使去敦促方勵之認罪。

11月15日，李潔明大使的確忠實地送來了鄧小平的敦促書。

中國有關部門發言人發表談話，敦促方勵之、李淑嫻盡早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我們已贏得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當前社會秩序業已恢復正常，國內局勢更加穩定。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動亂和暴亂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機關

1989年從4月到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擠滿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群眾，樹立起「民主女神像」。

(本報檔案照)

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發言人說，自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先後有幾名中國人躲進了外國駐華使館。目前除方勵之、李淑嫻二人仍躲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外，其他人均已先後離開了外國駐華機構，得到了政府的寬大處理和人民的諒解。

發言人敦促方勵之和李淑嫻迷途知返，趕快離開美國駐華使館，爭取寬大處理。這封敦促自首書算是鄧小平對我的1989年1月6日公開信的回信，二者的字數也差不多。

中美之間有關方勵之問題的第一次正式談判，於11月18日舉行。隨後又有幾次。12月上旬，布希再度派特使史考克羅訪問北京，談判達到高潮，一時很樂觀，似乎聖誕節前就可以圓滿收場了。

但是，很快就又冷卻變僵。因為鄧小平的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美國政府無意解除制裁，方勵之也沒有被大使敦促認罪。

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鄧小平之所以失算，是因為他一直



沒有明白中國不是地球的中心。在大陸，在鄧先生的統治下，一個人是否有罪，是不經法律程序，或在法律程序之前，就可以由他說了算的。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就不通行了。

我曾建議大使在談判時問問中國當局，我們到底犯有什麼罪？以便真是要寫認罪書的話，也好知道要寫哪一條。後來大使告訴我，這個問題他問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顯然的。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中共決收場 專機送走罪犯

友人心急 代寫認罪草稿

●4、5月間，中共最高層領導發動了一次宣傳攻勢，凡在他們接待傳播媒介時，總要提到方勵之只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這個攻勢，有些效果，我的一些國外朋友開始建議我接受這個條件，寫一句謊言「我認罪」，然後出來做事，是值得的。有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有一種文化，只要在寫「我認罪」時把中指和食指交叉起來，上帝就會原諒你的這句假話。羅馬的朋友則來信說，在強權之下寫「我認罪」並不是過錯，連伽利略這樣的大物理學家都寫過，你還有什麼好顧慮的？有人還附來當年伽利略寫的「認罪書」，以供參考。性急的朋友乾脆寄來人代我起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這種代寫的認罪草稿。

如果事態拖延下去，說不定我會接受其中的一份草稿。

但是，中共終於沒有拖過我，在我還沒有決定採用哪一份草稿的時候，中共就決定收場了。

收場一共用了十天。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中國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即行文中必須含有lenient(按為：寬大、仁慈)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出國治病我們接受，但請求寬恕書是絕不寫的。我們可以承諾不參與反對中國的活動，但拒絕保證不反對中



1990年6月25日接方勵之夫婦離開中國的美國專機，機組人員留給這對崇尚自由的科學家夫婦鼓勵與紀念的話語。(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國政府。

最後談判 一共用了十天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

6月18日，星期一，寫我的陳述。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外交部再次要求我的陳述中應有「認錯」(不是認罪)字樣。

我們拒絕。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談判至此達到成功。雙方在國賓館祝酒致意。

祝酒前。中國當局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李淑嫻決定接受一半。

6月21日，星期四，準備最終文本。全文如下。

1.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制。我注意到了，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序言的。

可見，通緝我們的命令發出半年後，檢察院連一份起訴書也還沒有準備好。一個多月後，那位副部長向大使宣讀了一份有關方勵之和李淑嫻的罪行「事實」的材料，樣子像起訴書，但又不是，因為無頭無尾，沒有關於方和李觸犯哪條法律的論證和結論。而且，只准大使當場聽，不敢將書寫副本作為一份備忘錄交給大使。可見，副部長對這份材料的質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為外交文件讓大使轉交我們。憑記憶，大使告訴我們，副部長大概念了14條「罪狀」。

14條「罪狀」不敢見諸文件

那位副部長算有一點自知之明，幸虧沒有把「14點」作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舉其中兩個例子，說明它的質量。「十四條」說，李淑嫻的「罪行」之一是「她於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學自治聯合會發指示」。但是，根據官方自己的「人民日報」，學自聯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這種罪行等價於今天殺了一個明天誕生的人。

「14點」又說，方勵之的一個罪行是他操縱在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人進行反革命意識型態宣傳。而按「人民日報」，該沙龍的主要兩個演講人是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德夫婦(Winston Lord)。所以，推論是方勵之犯有操縱美國大使夫婦罪。這是美國罪，還是中國罪？

針對這些，我們寫了一個「對『14點』的答覆」，其中有15點。第15點是：「方勵之表示，樂於就上述14個問題作公開的(如報紙、電視)作證和答覆。很可惜，像1988年的「外國存款

誹謗案」一樣，當局並不願意在公開法庭上作證和答覆。談判就此拖延下來。

2月是春節，3月也匆匆過去。4月開春以後，當局再次進行試探。他們的新策略是：希望美國不要因為兩個人的避難而影響兩個大國的合作關係，希望把方勵之問題暫時掛起來。在那之前，我就曾給一位美國有名的電視新聞廣播員寫過信，「我現在可是正好處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如果被掛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就更有「趣」了。

然而，美國國會的關心，使中國人權問題掛不起來。此路還是不通。

幾次碰壁之後，中國當局又轉回到所謂認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條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勵之寫一個陳述，行文中含有「我認罪」(I confess)。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時，我就寫了一個簡短的書面陳述。後來又改動過幾次。但各種版本中都沒有「我認罪」三個字。

各位讀者好：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即將出版的《方勵之自傳》，軟皮精裝本，全書27萬字，647頁厚，為塵封20年的方勵之親筆自傳，詳述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如何走上推動歷史進程的不歸路，內容精美感人，本報獲得本書的北美獨家優先刊載權及銷售權，為讓本報讀者先睹為快，特推出「《方勵之自傳》搶先專案」，凡訂世界日報一年\$200元，另加郵寄手續費\$7，即送《方勵之自傳》一本。本書預計五月下旬抵美後，另將於美東及舊金山世界書局現場銷售。



本專案訂報熱線

美東版紐約社：718-746-8889 (6207)
北加州版舊金山社：650-692-9936
南加州版洛杉磯社：323-268-4982 (191)
多倫多社：416-778-0888
溫哥華社：604-876-1338

即第一號警車，車後也尾隨兩輛「保護」。一路戒嚴的警察一看到0001車開路，就知道後面一定有個「角色」。於是，他們不自覺地就敬起禮來。

11:05，到達南苑軍用機場。美軍專機已經到了。

11:30，一位中國公安官員，由另兩位公安官員一左一右保護著，把兩本中國護照交給我們。那位被保護的官員，臉上出滿了汗，可能因為他感到這兩本護照是太重了。

12:40分，飛機一切就緒，登機，滑行，起飛。

就這樣，中國政府讓一架美國軍用專機送走了兩個中國人，兩名最大的被通緝的「罪犯」。

荒誕？世界本來就是荒誕的。(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李潔明：保護方勵之 戰戰兢兢

爭取離境條件 與中秘密交涉
像攪進家務糾紛 費神又費時
不滿方批布希政府 難以原諒



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保護方勵之順利離開中國，左圖為李潔明（左）1984年拜會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右圖為方勵之夫婦1989年在美国駐北京大使館內。（美聯社檔案照）



要聞組／綜合報導

方勵之來美後曾表示，李潔明（James R. Lilley）是一位很能幹的外交官，「我們是在進了大使館後才認識他」。在大使館那段時間，他和李潔明大使的交往，主要涉及美方和中方就方勵之夫婦如何出大使館所進行的談判。方勵之說，李潔明告訴他，中方當時負責談判的是外交部美大司負責人、後來升任副部長的劉華秋。

方勵之說，李潔明後來告訴他，以往和中方談判，美國往往是吃虧，「但是在你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吃虧！」中情局出身的李潔明在2003年4月在台北出版了「李潔明回憶錄」，敘述他一生在中情局工作，以及代表美國派駐兩岸的外交生涯，其中重點說明了1989年，他剛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就遇上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慘案。

李潔明在自傳中說，出任駐中國大使這段經歷，是他事業的頂點，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力抗北京壓力，保護方勵之夫婦的經過。以下摘自「李潔明回憶錄」，對照「方勵之自傳」所述，可以拼出當時較完整的圖像。

方勵之事件最緊張的一段時間是1989年6月底、7月初。中國政府對美方決定庇護方氏夫婦怒氣未消，於6月11日頒布逮捕令，指控兩人是「反革命分子」，這個罪名等同叛國，可以判處死刑。

方勵之事件事實是美方與中國在人權議題爭執上一個活生生的象徵。自從雙邊關係正常化以來，美方與中國在這方面便已對峙良久。只要方勵之夫婦仍留在美國大使館接受保護，中美已受到相當傷害的關係，要再修復可就更難囉！

屠殺過後的頭幾個星期，北京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下。老百姓靜默地辦喪事、奏輓歌；北京彷彿冬眠，悄悄地默哀悼亡……當局在全國展開緝捕反政府人士的行動，還發動宣傳工具消毒，中國百姓陷入難以言喻的恐懼。

政府反覆宣傳固然可以模糊對天安門屠殺的記憶，但真相已鐫刻在人民心中。我相信天安門廣場的沉痛經驗，已使外國人和中國人產生一種連結。我在6月15日向國務院呈報的電文裡記下：「這一點雖然很微妙，但在現今和25年前之間，已有了重大差異。」中國人民和美國僑民之間的連結，見證了天安門事件。北京的中國人和身歷血腥鎮壓的外僑，都不會忘掉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新中國已因人民解放軍雙手沾滿工人、學生的鮮血而蒙羞。

（1990年）5月間，布希總統宣布他將無條件延續中國享有的貿易最惠國待遇。我們在北京亟需這項助力來重新激活放行方勵之的交涉。

自從1989年底史考羅和伊戈柏格二度秘訪北京之後，我們就在較廣泛的議題範疇下，與中方針對方勵之

問題進行交涉。布希不願國會相當大的阻力，做出決定，把中方帶上談判桌。我在中國外交部的交涉對手劉華秋，邀我一起吃午飯。他要美方確實保證，方勵之獲釋後，華府方面會有回報的舉動。這頓午飯開啟了一系列緊密會談，釐清釋放中國最敢直言的異議人士之細節。

難就難在如何敲定協議。5、6月間，與中方進行一連串秘密交涉，我爭取准許方勵之離境的條件。此事費神又費時，因為我的角色很像攪進家務糾紛的中間人。我得把我和中方討論的結果，向方勵之報告，再把他的立場帶回談判桌和中方交涉。

中方擔心的是，方勵之一旦離開中國，會放言批評中國，成為反華活動的明燈。他們見到的喬治城大學得獎感言，恐怕還抵不上方勵之到了西方安全處所之後大肆抨擊的凶猛。中國政府要我們保證，會讓方勵之消音。

他們對我說教：「你們有責任遏止他的反中國政府活動。」我拿出美國憲法條文第一修正案辯護：「如果他到了美國，我們不能控制他的言行。」

中方又拿出一份聲明要求方勵之簽字，承諾不批評中國政府。這下子我們被將軍了。方勵之告訴我，他絕不簽署任何文件限制他批評北京領導人的自由，以及從事反中國政府利益之活動的自由。後來我們妥協，在聲明中採用「中國」這個一般字眼。選擇這

個字眼，使得方勵之離境之後的言行自由不受限制。方勵之告訴我：「我不會做任何不利中國的言行，但是，我將抨擊統治中國的這些王八蛋！」

很幸運，我們有了保留顏面的措施，可以說服中方同意。他們終究會推翻原先要逮捕方勵之、辦他反革命罪名的成命。他們需要一個合理的說法。春天時，我們得到一個好理由。方勵之向茱蒂抱怨胸部疼痛，我們立刻想到最壞的狀況——他有心臟病！

茱蒂安排他接受斷層掃描，查證是否心律不整。在交涉的初期，我提到方勵之的健康狀況，刻意誇大他的病情。方勵之起先反對以此作文章，但是我說服了他。然後，我向中方提出：若是以人道理由准許方勵之出境，他們可以賺到寬闊的面子。可是，他們對方勵之仍然有意見，建議可以讓中國醫生診治。

我為了大目標，不得不瞞隱真相，向中方強調方勵之可能有性命危險，需要出境診治。檢查結果，方勵之並沒有心臟病，只是消化不良，可是卻給了中方需要放人的藉口。最後的安排是，美國空軍調來一架C-135運輸機，把方氏夫婦送到英國，方勵之接受了劍橋大學天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的聘書。

6月25日上午10時半左右，方勵之夫婦藉一輛卡車為即將舉辦的酒會送椅子來的機會，離開大使官邸。中國公安護送他們到北京郊區的南苑軍用

機場。我奉指示，全程陪伴方勵之夫婦。到了機場，中方告訴我們，方氏夫婦必須獨自辦理出境手續。機場官員指出在走道末端有一個出境檢查櫃檯，已有公安人員團團圍住。這下子我可為難了。依指示，在他倆登上C-135運輸機之前，我不能讓他們離開我的視線圍；但中方堅持讓方氏夫婦獨自穿過海關檢查，以挽回顏面——他們要藉此展示在中國領土的主權！

我身為方氏夫婦保護人逾一年，曉得自己已變得非常呵護他們。可是，如果中方突然食言，逮捕他們呢？我盤算了一下，決定讓他們自己走，因為我研判中方若是撕毀辛苦交涉才達成的協議，損失可就嚴重了。縱使如此，我還是戰戰兢兢地望著方勵之孑然一身步向燈光幽暗的走道盡頭，把護照遞給出境檢查官員。好在這只是一道官僚手續。檢查人員問了幾個問題，在方勵之護照上蓋了章，讓他順利通關。

抵達倫敦之後，我們辛苦保護的這位貴賓，接受NBC新聞採訪，竟然抨擊布希政府在人權議題上有雙重標準，對蘇聯嚴格要求，對中國卻輕輕放下一——我可能原諒他竟然這樣抨擊布希政府。

【李潔明1928年生於山東青島，曾先後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1981-1984）、美國駐南韓大使、美國駐中國大使（1989-1991）。】（本文節選自李潔明回憶錄）



Ginny Gong

- 祖母
- 女兒
- 節目主持
- 政府主管
- 教育家
- 組織董事
- 忙碌的母親
- 交際家
- 選美皇后
- 熱愛舞蹈者
- 體貼的姐姐
- 良師益友
- 倡導者
- ❖ AARP 會員
- 社區領袖
- 能者多勞的人
- 作家
- 職業婦女
- 愛好烹飪者
- 義工
- 知心朋友

Ginny Gong (江惠珍)是一位資深的教育者，也曾連任四屆亞裔組織OCA(美華協會)全國主席。多年來，她一直孜孜不倦地為她的社區服務、為女性爭取權益和引領社會的改變。如今，Ginny作為AARP的終生會員，正過著精彩的生活。在陪伴她的孫子、照顧92歲的母親和開創自己的新事業當中，她體驗著人生的新階段。想要與Ginny一樣持續發掘生活，今天就和她一樣成為AARP會員，獲享專為50歲+人士而提供的幫助和資源。瞭解詳情，請上網到aarp.org/asiancommunity



方勵之談撰寫致鄧小平公開信原委

一封引爆北京暴亂的信

國際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中國民主啟蒙導師，方勵之教授生前近照。
(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右圖為1986年11月14日，許良英（左起）、李淑嫻、方勵之、劉賓雁商量召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中共據此，下令開除方勵之、劉賓雁與王若望的共產黨籍。
(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1989年到了。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發一超新星爆發。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今天的北京天文台當然早就沒有義務去為統治者預卜他們的政治未來了。

致函老鄧 呼籲大赦天下

但是，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未來。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訓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40年，又是五四運動的70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4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祺！
方勵之
1989年1月6日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就我說，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湮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證地引起收信人的關心。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經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中國，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東方紀事」的編輯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為他們的刊物寫稿。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3公開信 當局坐不住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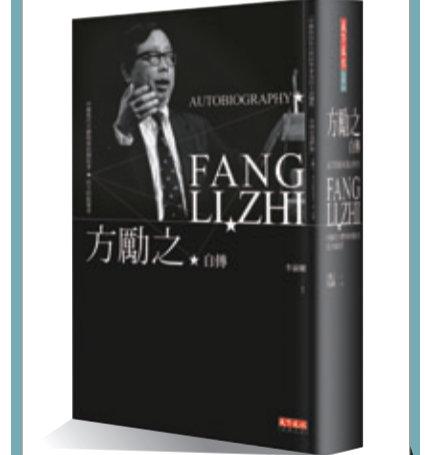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沉了。

各位讀者好：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即將出版的《方勵之自傳》，軟皮精裝本，全書27萬字，647頁厚，為慶祝20年的方勵之親筆自傳，詳述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如何走上推動歷史進程的不歸路，內容精采感人，本報獲得本書的北美區獨家優先刊載權及銷售權，為讓本報讀者先睹為快，特推出「《方勵之自傳》搶先專案」，凡訂世界日報一年\$200元，另加郵寄手續費\$7，即送《方勵之自傳》一本。本書預計五月下旬抵美後，另將於美東及舊金山世界書局現場銷售。



本專案訂報熱線
美東版紐約社：718-746-8889 (6207)
北加州版舊金山社：650-692-9936
南加州版洛杉磯社：323-268-4982 (191)
多倫多社：416-778-0888
溫哥華社：604-876-1338

小啟：昨刊方勵之教授在北京大學演講圖說，應為1988年5月4日。

1989年春天的原子彈爆炸

布希訪中 告別晚宴掀波

●就在這種「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看來還沒有多少現成的章法。總統面臨的選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的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一時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這顯然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參加總統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達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於中國領導人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極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和李淑嫻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人。就是我和李淑嫻真的到了場，也不過是五分之二的數量而已。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

然而，智囊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或不知道)，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宴會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劇中的宴會場次要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戲一唱到「擺酒設宴」場，就知道，高潮要到了。

們是客人的場合，居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只有五分之一，也不行。我知道此中的厲害。但三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北京天文台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們赴會。

當局的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呢？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五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我們赴宴。

五大對策 當局阻止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戒車。
2月26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婦和我們夫婦一行四人同乘一輛小車從中關村保福寺出發，一路向東，直奔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了。但是，當時我們都沒有注意。

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眈眈地橫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以為是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除。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了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住，堵住了我們去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的高級打手，他上來就架住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只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所謂「特工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



停車。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警察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都被警察命令不准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楣。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天色昏暗，氣溫下降。

我們四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車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

總之，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或一個自由人，至少要抵得上100個全副武裝的警察。
8：30，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過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了解到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進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一級待命狀態。
最不可理解的事最後一個，即對策

老布希總統在1989年2月25日訪問中國，並曾邀方勵之等不同政見人士作客。圖為布希總統重遊天安門廣場，向群眾揮手。
(本報檔案照)

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8：30-9：30，在霍雷先生的家一小時中，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飯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希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介知道今天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霍雷家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警察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布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警察的一夜按計畫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希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晚宴事件後，當局對我的「照顧」又增加了三分。
1989年2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同車走的還有其他三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中國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小顧，他原來是我當科技大學副校長時的助手。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三個人專來接我，而不管其他幾個同行。為首的迎接者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楊益泉。我明白，他們是當局特別委派來特殊「照顧」我的。因為楊等天文界的熟人，我不便為難他們，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車，立即離開是非之地上海，去蘇州。

楊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
「我這次只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炸。」
後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五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益泉非常高興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原子彈沒有爆炸！」
其實，在這時，「原子彈」已經被引爆了。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的確十分準確。
(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方勵之爭得20年有意義生命

妻李淑嫻受訪 稱夫君來美培養多名博士 寫了180多篇論文 建立北京—台北—美國聯合天體物理巡天研究...

記者曾慧燕／紐約—亞洲電話訪問

當年有「中國沙卡洛夫」之稱的知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和妻子李淑嫻，因「六四」事件避難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轟動世界，各方褒貶不一，2012年4月，方勵之病逝亞利桑納州，至死未能重返故國，他有沒有後悔過出走美國？

方勵之的妻子、原北京大學物理學副教授李淑嫻1日在接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表示，20多年來，他們沒有正式交談過這個問題。直到2011年感恩節當天，方勵之拉著李淑嫻的手說：「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其中，他提到了出走美國的決定，這是他們生命中的重大轉捩點。

李淑嫻回憶，當年他們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後，方勵之擔心影響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安全，給北京當局鎮壓口實，幾度欲離開使館，並「天真」地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為李淑嫻堅決阻止，最後他聽了她的話，「結果爭得後來20年的時間，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方勵之動情地總結說：「這20年的生命是值得的。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20年有意義的生命。」

李淑嫻說，他們抵達美國後，包括在國內外培養多名博士；寫了180多篇學術論文；建立、組織多種國際合作；建立起北京—台北—美國的聯合天體物理巡天研究，做出了成績，培養了大量人才，其中有不少在中國相關領域都是領軍人物。

李淑嫻說，現在許多中國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她接觸一些中國留學生，也是來到海外，看了錄像和相關報導，才知道當年中國軍隊的坦克，開進天安門血腥鎮壓學生。方勵之自傳所寫史實可與已解密和將解密的權威史料對比，更顯真實珍貴。

她說，現在此書得以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華人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提供第一手資料。「方勵之剛剛隱去，身後不僅有他的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李淑嫻說，1989年六四事件，她從一開始就反對學生上街，由於她經歷歷史政治運動，深知當局最後一定會秋後算帳，「到頭來倒楣的是學生」。她說，當局指她是「黑手」，其實她堅決反對學生絕食，她得知學生絕食的消息，還是在北大三角地碰到王丹來買絕食用的布條，當時曾勸阻，「但他們沒有聽我的」。



方勵之、李淑嫻伉儷情深。

方勵之2012年4月6日突然離世，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交代後事，李淑嫻猝不及防，迄今不能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實。過去她習慣於當某事有疑問就轉頭問丈夫，現在她有時還下意識有此動作，才驀然驚覺丈夫已捨她而去，她說這個致命打擊遠超過她一生中的任何打擊。

李淑嫻說雖然自己已70多歲，有丈夫相伴不時還有「一個小女孩的心態」，丈夫生前，她充分享受他的愛，丈夫給她一副堅實的肩膀，一個避風的港灣，給她溫情，她一直感覺自己是為愛而活，生活充滿陽光，心態很年輕，有時她會買一兩件漂亮衣服，故意穿上問方勵之「好不好看」，他會笑她，但從不干涉。「現在，再沒有如此心態，此情、此景也永不再來」。

有段時間，她沉浸在痛失愛侶的巨大悲痛中，幾乎不能自拔，她甚至覺得失去了丈夫，活著已毫無意義。在整理方勵之遺物時，她發現了他當年滯留美國使館寫的自傳，她覺得自己要完成丈夫的未竟之業，這成了支撐她重新振作的精神支柱，促使她捧起一顆流血的心，化悲痛為力量，並有一種紧迫感。

●方勵之抵美後，曾有人擁戴他出任民運領袖，統海外民運隊伍，但為他婉拒，引起一些民運人士非議。

李淑嫻解釋，「方勵之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

她學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為例，間接回答了外界的質疑。她說王丹獲釋來美之初，她曾出飛機票請王丹赴土桑會面，語重心長囑王丹勿為學運領袖的光環所惑，「那都是虛名，沒幾天就會為人遺忘」，一定要腳踏實地，繼續充實自己，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說話才有份量。

李淑嫻說，他們抵達美國後，她放棄自己獨立出外工作，主要盡心照顧方勵之的起居生活，讓她專注學術



1986年12月29日「八六」學潮期間，本報記者曾慧燕在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獨家訪問方勵之。（溫元凱/攝影）

塵封20多年的遺稿

●這是一份遺稿，一篇與中國近代史脈絡相連、卻被塵封的文字，由方勵之親筆寫成，忠實地記錄下他和我親歷的一段歷史，大部分寫成於二十多年前，未曾出版。開始，由於我們並不在意「商機」；後來，我們雖離開專制的直接控制，但它似乎仍然如影隨形，阻礙了這段真實的歷史由他親口述說。方勵之猝然離世，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找到它，決意付梓永為紀念。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此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讀來如同和他談話，時而尖銳直逼主題，時而開懷大笑似乎聽見他那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朗朗笑聲。方勵之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他所寫史實可與已解密和將解密的權威史料對比。

進入美使館 開始寫自傳

寫自傳，是進入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之後的事。

1990年6月25日上午10點多，我們從大樓走出，離開客居384天又10.5小時的大使官邸。李潔明大使和武官陪我們上了一年多前載我們進來的車，從正門駛出，直達北京南苑軍用機場。中午乘美國專機(由24126機組人員服務)飛離北京。此時，「自傳」20章的大部份寫完。到英國劍橋，很快完成，翻譯的朋友也到了劍橋。

1991年1月1日離開劍橋，繞道德國回報友人的支持、邀請並作學術報告。1月初到達(美國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在普林斯頓的一年裡，勵之分屬大學和高等研究所，除了上課、做研究，我隨地跑遍了幾乎美國各州，為了答謝各地朋友在我們困難時的支持、同時做學術交流。

新聞熱已過 出版社放棄

此時，「Doubleday」(出版社)抱怨，翻譯不合要求，我們另外的朋友願承擔改進或重譯，「Doubleday」堅持他們的人來做，派了翻譯跟到土桑(Tucson)，經一番遷延，最終放棄。勵之明白，新聞熱點過去，最佳商機也隨之失去，才是他們放棄的真正原因。

1992年1月，我們到土桑，勵之接受亞利桑納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

怕開罪中國 自傳又遭拒

不久，勵之告訴我，另一出版社主動向他約稿，但剛上課，在全新的環境、第一次以非母語講課，是要認真對待的，沒時間改寫，就把這份「自傳」原封寄去。事後，稿件退回。聽說一位有名的華裔物理學家審稿，稱此稿內容會開罪中國，為討好中國當局，判定「此稿不能出」。勵之說：「不出也罷，我有更多的事要做。」就此，將「自傳」擱置。

事隔20多年，此書得以出版。我欣賞這本書的出版社，正如它的名稱一樣有「遠見」。因為，中國作為大國，華人眾多，遍佈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繞不開這一段，更繞不開華人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方勵之剛剛隱去，身後不僅有他的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他著迷於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選定研究廣袤的宇宙。他熱愛生他、養他、苦難的故土，所以熱衷於教育。他說過：「辦好教育就是為未來鋪路」。在離國的20年，勵之除了正常教學、科研，還推動各種國際合作，尤其關心他的學生、以及他曾任副校長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現在中國這個領域中有眾多他過去的學生，親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看見他們成材、成功，他滿心歡喜。離國之後，不只一位朋友問他，若讓你自己選擇，最想做什麼，他常回答：「辦一所自由的、獨立的大學」，這也可以解釋他在科大副校長任上的作為。

突然間撒手 桌上留講稿

勵之！你突然離去，我捧起一顆流血的心，就像把你捧在我的手上，追尋著你留下的點點滴滴。兩天前在你最後離開學校辦公室的桌上，擺著的不僅是整整齊齊這學期上課的講稿、題解答案、學生成績；還有下學期要隨你做研究的三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及合作者的資料；為其中爭取到經費的來往檔；以及你科研中的新想法……似乎你剛走出去，不久即將回來。辦公室有一面牆，附貼著墨綠色的壁板，它是用來講課或討論用的，在黑板上，在諸多公式中，寫著「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沒被擦掉。

這，是你寫的嗎？至少是你留著的。它的意思是：「薪盡火傳、薪火相傳、灰燼之下，火仍在燃燒」。這是你一生的寫照，也是你要留給後人的話嗎？

方勵之一生追尋的是「生的意義、活的價值，做的是儘量更多的奉獻。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奮盡全力扛住的不僅是病痛，而是拚

成就。這20年來，他們沒有虛度光陰。「方勵之的學術成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收穫」。

●李淑嫻指出，鄧小平對方勵之心存不滿，主要導火線是1988年，方勵之在澳洲演講時，曾引述北京大學大字報說：高幹子弟在海外有存款帳戶，被鄧小平認為是針對他的子女，據說他曾諮詢法律專家，準備以「外國存款誹謗案」起訴方勵之，但法律專家勸說，方勵之並沒有公開指名道姓，不能構成誹謗。此事雖然不了了之，但卻大大惹惱了鄧小平，加上他率先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這使方勵之雖然自認為沒做任何違法的事，在六四事件中卻「在劫難逃」。

●李淑嫻和方勵之伉儷情深，他們在同一年(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兩人相遇、相知、相戀在充滿自由氣氛的校園。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李淑嫻先被定為「右派」，她本以為分手可以保存方勵之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曾約定「冷凍我們的愛」，並相信可以等得到春暖花開時，殊不知方勵之仍被定為「嚴重右傾」，即內定的「漏網右派」。李淑嫻說，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一旦被打為「右派」，就淪為社會賤民，但他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和真誠的愛，排除萬難組成一個溫暖的小家庭。在那個年代，多少夫妻因此離異，但「方勵之是個有情有義的人」，由於有丈夫的愛，她在諸般社會壓力下，總能挺起腰杆、抬頭做人，從不屈服。1968年文革期間，方勵之再次「被審查」，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兩人被迫分離長達18年。開始，李淑嫻在江西鄱陽湖圍墾的血吸蟲疫區勞務，方勵之被送到淮南煤礦下井，在地層深處挖煤。兩人歷經千辛萬苦，但心中有愛，始終不離不棄。李淑嫻說，本以為自己會在方勵之前離世，曾跟丈夫提過她若先走，希望他再找一個伴，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方勵之對此嗤之以鼻。

她本以為現在生活自由、平靜，她享受這種恬淡，兩人還有很長的路要攜手相伴，「我們是多麼的相親相愛，我一直以為可以到永遠。」現在「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她的悲痛難以言喻。她是學科學的，從不相信人死後有靈魂，直到她心愛的小兒子方哲在土桑遭遇致命車禍喪生後，她希望能與愛子靈魂相遇在第三度空間，現在恩愛一生的丈夫也離她而去，她更寧願相信愛能穿越時空，祈望方勵之在天之靈伴隨她到生命的盡頭。

李淑嫻



1989年2月26日，美國總統布希訪中國，在北京宴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圖為李淑嫻赴布希總統晚宴前。（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力扛住他視為生命真諦的責任；他企望打開通向光明、開向大同的路徑……科學的、文化的、社會的。正如他寫過：什麼是永生？肉體的永生是不存在的，也不必絲毫地奢求；然而，精神之永生是可以趨近或達到的。

勵之，在我的心裡，你是遙遠天際的一顆星，透亮的，頑皮的星啊！你飄然地來，帶來歡笑，以歡笑對著苦難；你光芒四射，以光芒照亮黑暗。在中國清明後的第一天，也是這年的耶穌受難日(4月6日)你又飄然而去，繼而，化為灰燼。這是飛升，飛升到天際，回到你的蒼穹；留下我獨自面對的離別，是生與死的離別。但在灰燼之下，你以生命點起的火仍在燃燒，你的後繼者，你摯愛的親人，以自己的生命延續你的生命，在這生命之火如花的火焰中有你的靈魂、你的心。

我以此書永誌勵之，我以此書奉獻給世人。（天下文化「方勵之自傳」書稿系列完）